

制度为先,史论结合 ——厉以宁经济学方法论的意蕴与启示

武亚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100871)

摘要:本研究基于厉以宁先生第一部经济学学术专著和五部学术代表著作,探析厉以宁先生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特色,揭示厉以宁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为本体的哲学方法论立场,以及制度为先、史论结合、博采中西、论从史出等优秀思想方法论特色。制度为先、史论结合是厉以宁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特质,贯通中西、唯实创新是其学术追求的精神旨归。中国特色现代经济学和经济与管理理论的健康发展需要大力弘扬厉以宁经济学方法论特质,他的诗词也展示了他学问的四境界及其巨大的精神指导力量。

关键词:厉以宁;经济学方法论;制度为先;史论结合;创新精神

中图分类号:F011

厉以宁(1930—2023)是我国“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名誉院长。他于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近七十载一直在北京大学从事经济与管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1988—2018年,他兼任多届全国人大、政协常委会委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是“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福冈亚洲文化奖”等多个重要学术奖项的获得者。

据不完全统计,厉以宁在1979—2019年出版的经济学专著和合著共约46部(其中不含主编、个人文集和诗词等),包含经济学理论、中国经济和经济史三个主要研究领域,其经济学思想构成了一套内容系统、紧贴现实、论证科学、注重在实践中发展的宏大理论体系^[1]。近期,王曙光从非均衡理论、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所有制改革优先论、“体制—目标—人”的经济学研究范式、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道德调节和效率双重基础论及外国经济史研究等七个方面评述了厉以宁的经济思想^[2];于鸿君和尹俊从研究问题、基本逻辑和研究方法等元范式角度对厉以宁经济学思想体系的范式创新特点作了

分析,并且提出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点、立足中国国情基点、选择科学方法支点、找准重大问题与理论发展结合点的重要方法论启示^[1]。本文尝试从厉以宁第一部经济学学术专著和五部主要学术代表著作入手,具体分析和探析厉以宁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核心特质——制度为先、史论结合,力图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经济学和经济与管理理论的创新提供些许方法论启示,并且昭示厉以宁学术创新精神的实践指导力量。

一、从第一部专著看厉以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立场

重读厉以宁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论加尔布雷斯

收稿日期:2025-01-22;修回日期:2025-02-15

作者简介:武亚军,博士,博士生导师,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经济思想史。

E-mail: wuj@gsm.pku.edu.cn

引文格式:武亚军. 制度为先,史论结合——厉以宁经济学方法论的意蕴与启示[J].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5(1):68-75.

色,就像他在评论加尔布雷斯的结构分析方法时所说:“结构分析方法又称制度分析方法,它主要不是进行量的分析,而是分析社会的结构及其变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它包括对制度、权力、利益集团的分析以及对于规范或价值判断问题的探讨。”^{[3]225} 实际上,厉以宁对于中国经济两类非均衡区分、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国民经济管理中后期结构调整,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道德伦理问题的重视和倡导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及“第三次分配”的观点,都是在借鉴和运用现代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第三,厉以宁和加尔布雷斯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学说史上的一对镜像,他们分别是中美著名大学——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的著名经济学教授,均学术著作等身,在政商学界影响巨大,都做过政府高层智囊或顾问,而且都是所在社会的制度改革派,最后也都获得了所在国家的最高奖项(厉以宁获得中国“改革先锋”奖章,加尔布雷斯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勋章”)。实际上,厉以宁和加尔布雷斯分别是所在社会中企业股份制的重要倡导者^[4]。厉以宁在此书中所评述的加尔布雷斯提出的“改造”经济学、把“关心人的自由和幸福(而不是把经济增长本身)当作经济学的主要课题”等观点^{[3]226},在厉以宁先生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得到重视及反映。更进一步,厉以宁在 1979 年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哲学立场或导向,也与加尔布雷斯在经济研究中所持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立场相类似。

在 1979 年改革开放初期,厉以宁在评述加尔布雷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理论时自觉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和实践为本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展现出坚定的、唯实求真的学术信仰。例如,他批评加尔布雷斯对经济数量分析方法采取简单的否定和嘲笑的态度是不正确的,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不忽视数量分析,但也不同意用数量分析来代替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分析^{[3]227}。同时,他尖锐地指出,加尔布雷斯的利益集团分析或权力分析脱离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来考察权力、用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来解释权力的转移,这混淆和抹杀了阶级阵线和基本的阶级对抗的事实,因而是“错误的”^{[3]228}。更进一步,厉以宁评述加尔布雷斯理论体系时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分为二、合二为一”“分析与综合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辩证逻辑方法作为其底层方法论,他明确指出,加尔布雷斯的经济思想,例如对资

本主义经济中小企业的困境的揭示,批判大企业垄断组织与政治的勾连,批评公共利益、妇女与少数民族裔发展被忽视等,虽然有客观、合理和值得借鉴的一面,但其体系从整体上说并不能反映(当期美国)客观经济现实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主要阶级对抗关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多种并发症的诊断和处方是“肤浅的”和“改良式的”,因而是“不科学的”或者说是“庸俗的”。在该书的总结部分,厉以宁还根据长时段的西方经济学说史的发展演进规律指出,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制度经济学说的兴起反映了该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深化的过程,它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异端”学者对主流“正统”地位的凯恩斯经济学说失效的不满及反动,其影响也可能继续有所增大,但其前景如同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凡勃仑为代表的美国旧制度主义的短暂兴起一样,注定只会成为经济学史上的一段小插曲^{[3]240}。从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来看,这个历史性学术判断依然是正确而深刻的,这也显示了厉以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方法论作为“批判武器”的强大学术功力^[5]。

二、从五部代表作看厉以宁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特色

结合厉以宁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厉以宁的学术代表作主要包括以下五部著作:《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1986)^[6]、《非均衡的中国经济》(1990)^[7]、《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1999,2010)^[8]、《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的研究》(2002,2015)^[9]和《文化经济学》(2018)^[10]。其中,后四部著作是厉以宁自己认定的主要学术代表作,而《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1986)之所以被笔者列为厉以宁的学术代表作,是因为该书在厉以宁经济学思想体系中具有奠基石作用:第一,基于“经济体制—社会目标—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研究递进三层次,厉以宁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新框架,并拓荒式发展了消费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及政策、中国特色环境经济学及政策、转型发展理论与区域经济学等专门学科或分支领域^[11-12];第二,这部著作比较系统地确立了厉以宁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制度分析特色和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方法论立场,其内容围绕经济体制之集权与分权、目标之理想与现实、人作为研究客体与研究主体三大核

心矛盾,结合中国与西方情境、宏观与微观分析、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等视角,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实践为检验标准,在比较分析多元经济学说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与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可行的经济政治技术条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实可行体系,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基本轮廓^[13],确认了现代经济学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科学的双重学术使命。这显著地体现了厉以宁在经济学研究中重视制度分析和伦理规范方法,即以“制度为先”的现代制度经济学方法论特点。厉以宁在该书导论中说:“我认为现代经济学体系至今并未定型,它仍在继续探讨和发展过程中,……这里所说的经济学面临挑战,既是指经济实践向经济理论提出了新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遇到的来自不同方面的非难。……那种不从实际出发,只会援引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个别词句并到处套用的做法,决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更谈不到什么发展马克思主义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最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6]2}实际上,厉以宁在该导论中还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实际上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因为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已经不仅被规范经济学的研究者所认识到,而且也被一些实证经济学的研究者所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究竟怎样在实践中发展,以及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当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6]5}这些论述都明确体现了厉以宁在学术创新实践中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辩证法和以实践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论立场。

《非均衡的中国》(1990)是厉以宁阐述中国转型经济体制分析与经济改革方案的理论代表作,它从当时社会主义现实经济中企业和政府的制度特点的有效刻画,即作为市场微观主体的国有企业无法自负盈亏和实现预算约束、政府行为的非理想性和实施替代性配额均衡出发,系统阐述了厉以宁以企业所有制改革为主线完善市场经济微观主体进而缓解结构性供需矛盾最终提高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效率的理论机理,是厉以宁结合当代中国转轨经济实际创造性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14]。他曾经说过:“应该称我是‘厉非均衡’而不是‘厉股份’。”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这句话需要把他的“非均衡经济理论”放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和世界经济思想史上的理论创新背景下来分析,而不能

将其局限在中国经济改革中所产生的实际政策影响效果,虽然他自己也尽全力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革在中国的政策实施。实际上,厉以宁的“非均衡经济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体现出两方面的重要创新:一是将现代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方法——一种本质上的“非均衡分析”应用于对中国转型经济分析和理论研究,这包括他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企业、市场供需均衡状况等的类型区分及政府非理想行为前提下的经济非均衡调整分析,厉以宁在《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曾经说过:“非均衡分析则认为经济现象及其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不能单纯用有关变量之间的均衡和不均衡来加以解释,而主张以历史因素、制度因素、社会因素的综合分析作为基本的分析方法。”^{[3]396}二是将熊彼特等人所发展的创新理论和社会演化方法论应用于当时的中国转型经济研究,包括他在书中对市场供求失衡矛盾缓解、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制度创新利益调整与规范化等过程的深入分析与刻画。笔者认为,厉以宁综合性地利用了现代制度学派分析方法和熊彼特等人的创新理论及经济社会演化分析等方法,而其发展过程受到厉以宁的老师陈岱孙、赵迺抃和陈振汉等教授注重经济思想史、制度学说与经济史传统的影响。实际上,厉以宁在20世纪80年代及晚年都多次强调“经济学研究要取得重要的突破,必须在经济理论、统计和经济史三方面打好基础”的熊彼特观点^[15],而熊彼特也被认为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史上对于经济理论和经济史两方面都有贡献和重大影响的第一人^[16]。

《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1999,2010)被厉以宁先生看作是自己的第二部重要代表作,笔者认为有以下两方面重要原因:第一,从经济学说史的学术视角看,它大致属于一种介于古典/新古典自由市场学派(强调市场调节)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强调政府调节)之间的新学说,即强调第三次调节和第三次分配。厉以宁认为伦理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调节手段在古老社会和未来社会(人的较全面发展后)都会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因此,厉以宁是从经济学说史角度提示其创新价值的,即提出该学说的学者是否有拓荒精神以使其经济思想在较长时期的学术历史长河(如50年以上甚至上百年的)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从而自成一家——厉以宁是这样评价当代西方经济学者的,也用同样的标准来评价自己的著作。实际上,厉以宁为《当代西方经济学100名家》(1989)所

写的序言,就旗帜鲜明地以“经济学创新需要有拓荒精神”为标题^[17]。具体来说,厉以宁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一书中明确指出:系统研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可以发现其人性假设是内含道德伦理因素的,即人是自利且有利他性的,但斯密关于人的同理心与利他性观点并未得到深入阐发^{[8]32};韦伯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文化理论及其方法论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值得继承和进一步拓展。实际上,厉以宁在自己的书中着重强调了韦伯理论或“韦伯热”带给当代学者的启示:社会经济发展必须要有强有力的信仰和精神动力,非西欧社会(包括南欧、东亚和中国等)的发展也都可以社会文化变革或道德重整中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并取得本土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大推进^{[8]209}。现在来看,这些20多年前提出来的开拓性观点就充分展示了厉以宁经济伦理道德作用论及第三次调节理论的创新性、前瞻性和指导性。第二,从研究方法上看,经济学的道德伦理分析或规范分析本身就是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看重的研究方法,该书也反映了厉以宁对现代制度经济学说及韦伯文化历史演进分析方法的拓展,全书的论述方法体现出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之“三史合一、制度(伦理)为先、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等重要特点。

《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的研究》(2002, 2015)是厉以宁先生在21世纪初整理完成的一部经济史学著作。按照厉以宁的回顾,它的最初出版立项可追溯到1985年的商务印书馆立项,而关于此课题的研究起步于厉以宁1962年在北京大学讲授外国经济史课程。因为1980—2000年他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问题,所以他1999年4月完成《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之后才下决心集中精力整理出版这部书,它可以代表厉以宁在“比较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创新成果^{[9]614}。实际上,该书也隐含了厉以宁对引导他研究此重要问题的北京大学经济史学家陈振汉和周炳琳教授的学术承传与成果回馈。从研究问题上看,它试图对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这样一个重大的经济史现象进行理论解释,而厉以宁所采取的研究方法论属于制度分析、历史演化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即他摒弃了先前从商品货币关系、产权、新教伦理与市民意识等方面进行资本主义制度起源研究的既有方法,而对西欧原生型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制度的产生和调整进行深入的权力结构演进分析,具体表现为建立封建体制外权

力中心(城市)、异己力量的兴起(商人)以及封建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的区分及经济制度调整等历史进程的分析。这可以看作是厉以宁从制度主义经济学视角出发对“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相统一”(即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同时,在该书的论述中,厉以宁对资本主义起源的模式演进采取了区域及国别比较分析方法,还包含了对近代韩国等非原生型资本主义发展和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演变状况的对比分析,这体现了厉以宁在世界和国别经济史研究方面的广度和深度,也体现出他博采中西、精益求精的学术追求和经济学者力求“经世济用”的优秀治学传统。

《文化经济学》(2018)作为厉以宁认定的最后一部学术代表作,是他最近30多年经济学规范分析、经济史研究和经济人文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也标志着厉以宁的经济学术思想达到其最高峰。正如他在该书导论中所说,他对文化与经济发展紧密关系问题的思考受周炳琳和陈振汉两位老师多年的影响,这使他较早建立了文化史、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之“三史合一”的研究方法理念^{[10]2},并把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学人文哲学的思考贯穿于自己一生的学术研究之中且加以升华,即从《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的经济学层次论、人的全面发展目的论,上升到经济学和管理学既是社会启蒙又是社会设计科学的本质论、信仰论,从而不仅在中国独立开创了“人文经济学”这一特殊领域,也对现代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正确发展方向给予指示。具体来看,在这部著作中,厉以宁创造性地辨识了文化作为产业与文化作为学术、文化作为启蒙与文化作为设计的辩证关系,研究视野涵盖中西古今,论述范围涵盖政治、经济和社会,他从文化产业与产品到文化启蒙、调节与制衡,从文化包容、自信、传承与创新到文化管理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辩证发展了中国式“文化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和内涵,论述了以“现实人”假定和“文化包容、文化自信、文化创新”为核心的社会文化哲学主张和学术理论见解,对全世界和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文化启蒙、道德重整与创新予以昭示,也对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正确发展方向予以指导^{[10]312}。

综合以上对厉以宁第一部学术专著和五部主要学术代表作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厉以宁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三个鲜明特色:第一,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批判的武器,分析评鉴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观点与局限,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高目标”

构建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典范之一^[5];第二,他对当代西方制度经济学说的方法论进行了全面的扬弃,批判了其具体观点的错误,吸收了制度分析与伦理道德规范分析等方法论精华,沿袭了其批判现实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立场,并以此用于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学术创新与政策改革建议,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说的新发展,在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与转型发展的学术实践中实现了“武器的批判”,即以“制度为先”的非均衡理论分析及股份制改革等一系列政策创新;第三,他在北京大学经济史学传统上尝试建立经济史、经济学说史、文化史之“三史合一、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文化主导、博采中西”的现代比较经济制度学说和文化经济学综合研究方法,是他在中西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基础上对现代制度经济学说、熊彼特社会经济学“经济理论、历史与统计方法”三结合方法论和韦伯“经济社会学”之文化信仰主导论的集成发展,是一种“大树长新叉式”的开天辟地^①。

三、对中国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两大趋向的担忧及中肯建议

在2015—2016年完成《文化经济学》的写作以后,86岁的厉以宁开始把剩余的精力投向对社会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方法趋向的正确引导。针对政治经济学界一些过度强调传统政治立场或墨守成规的保守及畏难思想,2016年6月2日,86岁高龄的厉以宁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语重心长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于实践,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赋予新的内容,并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发展的科学,它不可能停留在某一已经达到的水平上。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推向前进,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18]他还强调,“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根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才能发现新问题,了解新问题出现的原因,才能对新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并提出新的对策。这样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8]厉以宁强调,科学地、创造性地解释与应对社会主义现实新问题而非固守教条或先验观点,并

不是要否定或背弃马克思主义,而是真正科学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坚守,是真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例如,他在文中举例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承包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就像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三块大石头,激起层层波浪,从此中国经济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平静下去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改革和发展实践的指导,谁还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威力呢?”^[18]他还举例说:“中国的第三产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超过50%了,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从工业化阶段逐步转向后工业化社会、信息化社会,应该把新兴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列为下一阶段的发展重点:重结构调整,重效率,重效益。这样,既可继续完成工业化,又可以使信息化加速推广。这一发展方式的转换是不可避免的,否则我们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制造强国、创新强国、信息化强国。”^[18]

一年之后,针对我国近十多年以来过于追随西方科学化(特别是实证化、机械化和功利化)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风气造成忽视历史学和经济学规范分析的错误倾向,厉以宁在2017年6月13日的《光明日报》上又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学应加强历史研究和教学”的长篇专题文章。在文章中,厉以宁结合自己60多年的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经验以及中外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事实,恳切地阐述并强调了以下重要观点:第一,学好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可为经济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当前的经济学教学存在对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错误现象;第三,学习经济史,可以明白我们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四,学习经济学说史,可以知晓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所在;第五,对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说需要深刻反思或超越;第六,经济学是一门历史学科^[19]。在阐述中,他还明确地指出:“经济学大体上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宏观经济学部分,二是微观经济学部分,三是制度经济学部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都采取数量分析方法,考察经济中有关变量之间的关系。二者的区别在于: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采取总量分析方法;微观经济学以个别经济单位(企业、家庭、个人)和个别市场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采取个量分析方法。除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外,还存在采取非数量分析方法,以所谓‘质’的问题作为对象的制度经济学,它强调制度、伦理、文化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分析经济

活动过程中的权力分配和利益集团的冲突,探讨经济行为的评价标准和选择原则等。但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说中一直处于非主流的地位。”^[19]实际上,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作为古典经济学开端的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这三方面都包括在内而未发生分离,只是其后的继承者逐渐使之发生了分化和分离,从而产生了质性与数量、实证与规范分析相分离等现象。显然,通过这些阐述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厉以宁对当代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基本结构的看法、他对现代制度经济学说及其分析方法的重视,以及强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眼光批判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基本立场,就像他自己 30 多年前对“加尔布雷斯制度经济学说”所进行的批判性分析或“扬弃”一样。在这篇评论的最后,厉以宁还大声呼吁中国经济学研究要超越“经济理性人”而走向“完整现实人”,并且倡导坚守“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历史的科学”的本质界定,倡议在社会发展实践和历史经验总结中让“社会主义经济学继续发展壮大”^[19]。

四、余论:厉以宁经济学方法论和学术精神的重要启示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厉以宁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特质,即实践为本、制度为先、史论结合、博采中西等,这些特点对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和国民经济管理学发展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首先,中国当代经济学科的领军人物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基础、以实践为本、以制度为先,构建并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民经济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事实上,厉以宁的《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在 30 多年前就为我们开展这一工作进行了前瞻性探索和理论准备。随后,在此基础上他于 1986 年出版了专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20],运用制度前提与制度改革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围绕国家、企业、个人三个层次系统分析了国民经济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等问题,展示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全貌,并且提出了经济发展平衡非目标论、政府二次调节论和宏观经济调节松紧搭配论等创新性理论观点。1988 年,他又出版了《国民经济管理学》专著,从近期、中期、远期出发,系统构建了国民经济管理的综合理论体系,突显了制度分析与结构分析等方法论

的重要价值^[21]。从最近 30 多年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应该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发展(特别是转向“强市场+强政府”或“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等)、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等建立起涵盖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相统一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理论体系^[22-23]。同时,实践为本、制度为先的经济学方法论不仅要求我们把制度分析作为整体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支柱,而且意味着在我国各个分支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中把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数量分析与质的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经济分析与社会心理分析等有效结合,从而创新性地开拓有理论指导力和整体解释力的现代中国经济学分支学科,如中国转型发展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等。实际上,厉以宁教授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就围绕其中的不少重要领域展开了持续探索,取得了拓荒式创新成果,为我国经济学界后辈学者作出了表率^[24-26]。

其次,意图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学者们应该在具体经济理论创新发展和政策建议中借鉴并弘扬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优良治学方法。实际上,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学的重要方法论,也是中国特色经济学作为历史学科定性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有助学者在审慎辨析和确证社会经济史料可靠性的基础上发展较可信的经济理论;另一方面,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又可以使具体的特定领域的经济学研究产生更为符合实际的全面观点,因为经济发展的客观历史往往是多因一果的复杂过程^[27]。更进一步来说,厉以宁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史论结合往往还包括经济学说史甚至是社会文化史,这使得学者们可以更系统地批判借鉴已有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下的经济学思想,提出更符合我国实际包括契合我国混合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背景的经济理论或政策主张。实际上,本文前面所述的厉以宁提出的中国经济非均衡理论、中国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和道德伦理第三次调节理论等都是创造性地融合经济现实问题、经济学说史和经济理论的创新性学术产物。

再次,中国当代本土学者们应该借鉴并弘扬厉以宁博采中西、唯实创新的优秀方法论及学术精神。实际上,中国当代特色的经济管理理论和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在时间上都后起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特别是英、美、法、德等国,其理论发展应当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理论及中外优秀学者的已有经验,批判吸收其合理成分,进而结合中国经济和理论发展的实际需要和现实要求,融合性、创新性地提出适合中国情境的新理论、新学说和新政策建议。事实上,厉以宁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很多经济理论构建与政策建议就与他早期对中外经济学思想学说的博采众长、融合创新有很大关系,这里面不仅包括他在北京大学求学和工作时对陈岱孙、陈振汉、周炳琳、赵迺抃、罗志如等学者的师承和兼容并包,也包括他对前述的加尔布雷斯的制度经济学说的批判吸收,还包括他对罗斯托经济起飞理论、诺斯的制度创新学说、熊彼特的创新学、韦伯的经济发展文化主导论、福格尔的新经济史学革命、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以及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等众多世界级学者相关思想的批判吸收^[27]。他在2018年接受的一次访谈中回忆其早年学习和工作经历时说:“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爬上来的。”在现代信息革命和知识文明时代,我们当今的本土经济管理学者有更好的条件接触、借鉴中外优秀学术成果,更应弘扬厉以宁博采中西、唯实创新的优秀治学方法论和学术精神。

此处还需要强调的是厉以宁在中国古典诗词创作中所吸收积累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与创新素养的伟大力量。就像现代著名管理学者韦克(Welick)所断言:“所谓的理论构建就是有规训的想像。”^[28]厉以宁自中学求学起直至2018年,共撰写了超过1416首中国古典诗词(含五言、七言绝句及多种词牌名诗词),并于2018年结集出版《厉以宁诗词全集》^[29]。笔者认为,这1416首古典诗词实际上代表了厉以宁在其一生中遵循中国古典格律诗词规则而对日常生活所作的敏锐感触与深度思考,是一系列丰富感情与深度思考下的“微型生活理论”的真挚创作。厉以宁在其1996年《答友人》中说:“诗是深思词是情,心泉涌出自然清。从来奉命无佳作,莫给后人留笑名。”^{[29]606}这首诗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厉以宁进行“(生活)理论创作”时遵循的方法论和思想原则,值得我们记录在案并探寻其学术方法论意义。

最后,本文借用厉以宁的两首诗词妙句来概括其学问境界和笃学及创新精神。1955年,厉以宁大学毕业时写了一首诗名为《大学毕业自勉》的七绝: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这首七绝展现了青年时期厉以宁矢志笃学的坚定志向,30年之后的1985年,厉以宁将此诗扩展为一首《鹧鸪天》,展现了他在学术

道路上博采兼容、不问得失而后功到天成的心路历程^{[29]93}。借鉴王国维用中国诗词论学问三境界的句式,我们或许可以借用这首扩展词来重述学问之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此第一境也。‘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此第二境也。‘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此第三境也。进一步,‘倾听江下涛声急,一代新潮接旧潮’。或为第四境也。”^{[29]402}这两首诗词妙句所展示的厉氏学问四境界——矢志笃学、博采兼容、功到天成及助推后学,或可视为厉以宁用诗词留给当代中国经济与管理学者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一份重要学术精神遗产。

注释:

- ① 李稻葵在最近一次学术会议演讲讨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道路时,提出了“大树开新果”(走西方规范化国际化道路研究中国问题)、“重新育苗、栽树”(另起炉灶、创立中国特色经济学)和“大树长新叉”(即提炼中国经济经验,创立经济学新分支)三种经济学发展方法。

参考文献:

- [1] 于鸿君,尹俊. 经济学理论和中国道路:厉以宁经济学思想述评及其对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启示[M]//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编写组. 一生治学当如此:厉以宁经济理论述评.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1-25.
- [2] 王曙光. 经济非均衡、市场主体和转型发展——厉以宁经济思想述评[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163-173.
- [3] 厉以宁. 论加尔布雷斯的制度经济学说[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 [4] 胡义成. 美国学者对“股份制社会主义”的探讨[J]. 六盘水师专学报,2001,13(2):7-10.
- [5] 厉以宁.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阶段[J]. 财经理论与实践,1986(2):1-7.
- [6] 厉以宁.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 [7] 厉以宁.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 [8] 厉以宁. 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 [9] 厉以宁. 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10] 厉以宁. 文化经济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11] 周黎安. “以人为本的经济学研究:重读《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M]//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编写组. 一生治学当如此:厉以宁经济理论述评.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172-188.
- [12] 武亚军. 心未变,道尤宽:厉以宁环境经济思想与政策研究 40

- 年发展评述[M]//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编写组. 一生治学当如此:厉以宁经济理论述评.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0:127-153.
- [13] 刘伟,孙来祥. 一部在实践中呼唤诞生的力作——评厉以宁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J]. 中国社会科学, 1988(1): 113-121.
- [14] 姚洋. 非均衡分析对中国经济学和中国改革的贡献——读厉以宁老师的经典著作非均衡的中国[M]//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编写组. 一生治学当如此:厉以宁经济理论述评.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0:189-203.
- [15] 厉以宁. 我与北大[M]//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11-16.
- [16] 陈振汉. 熊彼特与经济史学[M]//巫宝三, 陈振汉. 经济思想史论文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55-87.
- [17] 厉以宁. 经济学创新需要有拓荒精神[J]. 江苏社会科学, 1989(1):62-64.
- [18] 厉以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发展[N]. 光明日报, 2016-06-02(1).
- [19] 厉以宁. 中国经济学应加强历史研究和教学[N]. 光明日报, 2017-06-13(11).
- [20] 厉以宁.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 [21] 厉以宁. 国民经济管理学[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8.
- [22] 顾海良.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研究[J]. 求索, 2017(12):4-13.
- [23] 顾海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 [24] 厉以宁, 章铮. 环境经济学[M].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5.
- [25] 厉以宁. 转型发展理论[M]. 北京:同心出版社, 1996.
- [26] 厉以宁. 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 [27] 厉以宁. 厉以宁经济史论文选[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 [28] Weick K E. Theory Construction as Disciplined Imagination[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 14(4): 516-531.
- [29] 厉以宁. 厉以宁诗词全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

Putting Institution First and Combining History and Theories —A preliminary study on Li Yining’s Economic Methodology and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WU Yajun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is predicated upon Mr. Li Yining’s inaugural academic monograph in economics, along with five representative scholarly works, with the objective of delving into the distinctive methodological that characterize his economic research. It elucidates Mr. Li’s philosophical stance, firmly rooted in Marxist practice, which serves as the cornerstone of his economic thought. Furthermore, it highlights his remarkable methodological traits, such as prioritizing institutions, integrating historical analysis with theoretical discourse, drawing from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and deriving arguments from historical contexts. The emphasis on institution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historical analysis constitute fundamental attributes of Mr. Li Yining’s economic methodology. His scholarly pursuits embody a spirit that transcends cultural confines while accentuating practical innovation. The healthy advance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economics, along with theories pertaining to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ecessitates an ardent promotion of the distinctive qualities inherent in Mr. Li’s economic methodology. Furthermore, leveraging his poetry can illuminate the four realms of knowledge and unveil their profound guiding power influence on intellectual endeavors.

Key words: Li Yining; economic methodology; putting institution first; combining history and theory; innovation spirit